

## 国际关系

# 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与变革

潘亚玲 张 春

**[摘要]** 当代国际关系自其诞生以来始终遵循着三大传统:个人主义、民族国家及进步或科学传统。这三大传统相辅相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稳定与延续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物质与观念的变革,它们正日益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国际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或将要发生。然而国际社会的变革方向或目标并不明确,其决定因素不仅有体系层次的变革,还有单元层次对体系层次变革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以及体系层次的再反应、或者说是新旧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的斗争。

**[关键词]** 国际关系传统;国际关系的变革;退出;呼吁与忠诚;宽容与不容异己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4)02-0015-20

作为一个智力研究领域和人类行为领域,国际关系是受传统束缚的。当今国际关系中的诸多实践,如外交豁免,是因千年之前就已为人所认识到的环境所造就的。然而,今天的世界毕竟不同于500年前的那个世界;它甚至已不是我们的父辈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经济、技术、体制等物质方面以及思想方面的变迁,已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传统构成了严峻挑战。当代国际关系变革的方向或目标究竟会是什么、其变革进程缓和抑或剧烈,目前都无法准确预测,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体系层次的包括物质与思想观念的延续或变迁,还取决于体系层次的变革所导致的单元层次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及此所导致的体系层次的再反应,或者说是新旧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的相互斗争。国际关系变革的这三个方面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使国际关系的传统不断得以深化与革新,从而促使体系逐渐由低级向高级演进。

### 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

当代国际关系自其诞生以来,虽然历经演变,但始终遵循着三大传统:(1)个人主义传统,即个人是、且应当是政治事务、因而也是国际事务的中心角色;(2)民族国家传统,即所有人类活动都应被组织到我们所称的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框架之内;(3)进步或科学的传统,这意味着人类理性可以理解所有自然与社会、包括

国际关系的各种现象。<sup>[1]</sup>

启蒙运动为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扫清了道路。个人是、且应当是政治事务并因而是国际事务的中心角色,这一命题贬低了诸如部落、人种、种族等替代性政治代理人的地位——虽然政治体系已在部分这些受贬代理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且不存在缘何这些体系不能运作的必然理由。但启蒙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将个人从王朝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启蒙运动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个人自由。<sup>[2]</sup>

当代国际关系接受了启蒙运动的这一思想,使之成为自身的一大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代的初期,国际关系所思考的个人是那些手中拥有重大权力、并能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个人。此后至18世纪末期间,人权变成了国权,尽管从那时起个人被宣布为越轨和超出研究范围,但它仍一直萦绕在人们的脑际并反映在政治思想中。此时的思考将目光从先前的少数个人转向卢梭的人民大众,但却犯下了将“人民”抽象化的错误:人权几乎被剥夺而变成了国家的权力。<sup>[3]</sup> 19世纪,由康德开创的哲学与伦理传统,由科布登所阐明的自由—激进的思想学派,由蒲鲁东所代表的近似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由马克思推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基督教世界主义的各种思潮,均公开地坚持个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20世纪,世界封闭状态的结束,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价值观的发展,民主的进

步,可能改变国界的国际主义大动员的惊人技术创新和可摧毁世界的两次世界性冲突以及恐怖武器,所有这些都大有助于那种有利于个人主义逻辑的理想主义的复苏;而这种个人主义的逻辑,正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大传统,它自1939年以来成功地被揭示了出来。<sup>[4]</sup>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法主体的变化可谓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侵略战争及战争罪行的责任追究与制裁、禁止大规模屠杀(或称“种族灭绝”)、保障基本人权等领域,国际法的管辖对象已从主权国家扩展到包括人权在内。<sup>[5]</sup>

民族国家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人关注、最可见的国际关系传统之一。人们一般将民族国家的创建追溯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承认出现于16世纪末的关于国家政治与法理性质的国家主权原则,并奉安全为圭臬,指出此后的政治合法性应基于主权领土划分,而不再有高于国家主权的其他权力。<sup>[6]</sup>尽管国家主权原则起源于西欧,但西欧首先得被迫承认非西欧国家在西欧国际法体系内享有有限地位;非西欧国家也被迫承认西欧国家在其国际法体系内享有有限地位,这样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才成为可能。<sup>[7]</sup>因而,民族国家虽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大传统,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才真正得到普及: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国家主权得到欧洲国际社会以及美国的认同;此后,主权观念逐渐扩散,首先是那些接受西方价值观的非西方国家,其次是所有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新生民族国家。<sup>[8]</sup>尽管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国际关系的根本组织原则而正式宣告了这一传统的法律地位,但其真正内涵从未完全实现,它仍更多地是法理原则而非实际行为准则。正如依附论者所指出的,“伴随着法律主权的每一次重申和扩展的,是以力量均衡为基础的事实主权的削弱”。<sup>[9]</sup>

人类世界观的最大变革发生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革命之后。从培根和伽利略开始,进步与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成为一种长期的时代潮流,并逐渐应用到各种人文科学。<sup>[10]</sup>这种进步或科学的观念,或者说是“人的理性能认识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观念,一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立即成为国际关系一大传统:国务活动家们寻求将国际关系总结为一门技术,而理论家们寻求将国际关系概括成为一门科学。国务活动家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繁杂的理论问题,但他们却都尽最大努力将各种日常的国际关系实践归纳成某种(些)模式,使其标准化,进而最终成为一门技术——掌握它可能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如外交准则、

外交谈判技巧等。乔治·凯南总结道,“可以肯定的是,好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同坏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一样。”<sup>[11]</sup>与国务活动家们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相信,他们揭示了、而非发明或创造了只要人们正确运用其理性就可理解的、可普世应用的恒定法则。<sup>[12]</sup>这仅从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的几次大争论便可看出。进步或科学的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但同时也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单化、形式化、机械化等等缺陷,毕竟国际关系是一个人类行为的领域,不能与有着严格规律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原则与民族国家原则并无内在冲突。如同洛克所认识到的,尽管自然状态是和谐的,但个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完全保护个人权利,因此民族国家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sup>[13]</sup>这样,民族国家传统实际是个人主义传统的一种扩散。<sup>[14]</sup>科学主义或者说国际关系科学化的传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是为前两大传统或其中之一作合法性的辩护,并因而引发各种智力努力。

### 当代国际关系的变革

与其他体系一样,国际关系体系也处于绝对的变革与相对的稳定之中。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变革意味着在新的模式形成并且深嵌于其日常议程之前,现存模式的磨损、秩序的减弱以及治理的停滞。<sup>[15]</sup>K·J·霍尔斯特非常细致地辨识了变革的几种类型:作为替代的变革(change as replacement)、作为添加的变革(change as addition)、辩证的变革(dialectical change)以及转变(transformation)。作为替代的变革是指过去的一切类型结构都将为新式的所取代,这种变革是非延续性的。而在许多别现象中,新东西并不必然是对旧东西的替代;新旧可以共存,这些变革只是种添加,仅仅增加体系的复杂性。辩证的变革不只是添加,它代表着新模式是建立在旧模式的基础上的。因而,就既存在新奇性、也存在延续性;它不用总体替代,因而可将新旧结合起来。而转变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可能导致量变甚至质变,它区别于旧有观念、实践及范式在保持相当长时间稳定不变后的遭废弃,而是一种机制功能上的变化。<sup>[16]</sup>

霍尔斯特所讨论的变革类型涵盖了当今国际关系传统所遭遇的几乎所有挑战:今天对个人人权的尊重似乎更不如前,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灾难比比皆是,其中最让人们感受到道德震撼的当属2001年的“9·11”

事件;民族国家的日子也日渐难熬,各种新的行为体不断增长,导致民族国家似乎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就连理论的发展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冷战的终结与所有理论的预言落空就是显例。因此,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而且,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如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却经常带来相反的结果。<sup>[17]</sup>然而,无论秩序与变化怎样被界定,无论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如何被强调,每一个传统所遭受的挑战、每一体系的变革都可能是不同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动因以及不同的技术、社会经济和心理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sup>[18]</sup>换句话说,任何国际社会的演变都可能归纳为物质与观念两方面的原因。物质条件能塑造一些基本的规则、进而使秩序得以维持;反过来,物质条件的变化也能加速主流秩序的崩溃或至少发生结构性变化。<sup>[19]</sup>促进国际关系变革的物质条件中首先应提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变化驱动着各个层次的社会发生变革,包括体制以及政治的变革。对当今国际社会来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爆炸更大的效应可能是大规模的跨国、跨区移民,以及因此而激化的种族矛盾甚至是种族灭绝。<sup>[20]</sup>技术变革最经常地被当成一种“外部震撼”——它是一种外部力量,赋予体系一个启动力量,从而发动体系内的一系列变革。这主要因为,(1)技术构成了宏观历史考察通常所要关注的大的“结构性力量或条件”;(2)技术变革本身是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它会激发其他的大规模结构因素,如人口、市场等等;(3)技术变革经常被认为具有中层的社会效应,这与其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sup>[21]</sup>当代世界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传播和应用使收集信息、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几乎可以同时完成,不必再考虑自然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真正形成吉登斯所谓的“脱域机制”。<sup>[22]</sup>

当前的全球大变革更为基本的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力量,并对其他领域相关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始于16世纪的欧洲经济世界的扩展,导致了一个世界规模的贸易网的形成。<sup>[23]</sup>金融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生产的国际网络化业已形成,世界经济组织迅速增长,众多的跨国公司进行的不断增加的信息、资本和物资的交流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如果说技术的创新可被称为体系变革的“外部震撼”的话,则经济变化可被称为体系变革的“内部基础”。

国际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还包括更难以改变的体制、制度层面。国际社会的体制、制度的变革往往滞

后,且由于传统的强大力量而进展缓慢。今天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及环境、健康、人口等全球性问题的的重要性上升,大大加强了对于国际社会的体制、制度、规范等进行变革的要求。它不仅带来了并不仅仅限于纯粹的民族国家边界内的问题,也可能通过创造某种社会价值观得以广泛接受的环境从而导致变革的要求,还可能为某些在政治上动员起来的私人利益集团服务。正因为此,今天国际社会的体制、制度与规范层面的变革似乎远比任何时期更为剧烈。<sup>[24]</sup>

与这些物质条件相对,观念的变革对于变革更具重要意义,因为物质条件的变化只能改变秩序的内容,而不能根本改变秩序的结构。霍布斯鲍姆说,“科学的进步也得益于新问题的提出、对旧问题的新看法、处理或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或研究的新理论与实践工具的新发现。”<sup>[25]</sup>观念革命是种打破传统世界观的力量,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当前,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大变革而来的人们对未来重新获得了某种控制力,激发了各类力量的控制欲,从而更多地加入到未来国际社会的建构、尤其是观念的建构中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变革。<sup>[26]</sup>

#### 行为体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

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于1970年提出了“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在总体上都具有从富有效率、理性、守法、高尚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落的倾向,也就是组织的绩效会发生衰减;在组织绩效衰减的情况下,组织的消费者们将倾向于退出组织或者留在组织中但通过呼吁以求组织绩效得到改善或根本的恢复;在消费者作出退出或呼吁选择的过程中,对组织的忠诚对于延缓退出具有相当的功效,能使呼吁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sup>[27]</sup>

国际关系体系的变革将给其行为体带来至少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可能既强化体系中现有行为体的某些能力、同时也削弱其另一些能力。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双重影响便是显例。第二,这种变革可能导致许多新的、超越国际体系现有主要行为体边界的体系性问题产生,从而导致对其行为体功能变革、甚至是呼吁新行为体产生的要求,对民族国家功能的怀疑、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生都是典型。第三,或许最为重要的影响是,国际体系的变革还会对体系内的行为体之间——新的与旧的、新的与新的、旧的与旧的行为

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

国际体系的变革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可称之为“绝对绩效衰减”,如当今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国际体系的变革可能更是积极的,它对体系结构进行修正,套用赫希曼的术语,可将这种积极的变革称作“绩效增加”。但这种“绩效增加”却会触及现有体系受益者的利益,导致利益分配发生不利于它们的变化,因而可能被这部分势力视作“绩效衰减”,或可称之为“相对绩效衰减”。

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对“退出、呼吁与忠诚”机制影响颇大的特殊现象,即公用(害)物品的问题。公用物品指那些能够为体系内所有行为体所共享的、并且无需支付额外代价的物品,具有共享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sup>[28]</sup>此外,公用物品还有另一特征,即只要身居其中便免不了此类消费,一国的法律、外交、军事、公共政策等对国内所有行为体而言都具有这种特征。公用物品在其为行为体不能享受的意义上就会成为公害物品,如一国的国民保护政策对难民来说可能就是公害,因为他无法享受因而这样的政策只能使他比别人处境更差而非相反。公用(害)物品的存在对于培育体系行为体的忠诚、阻止行为体退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退出意味着体系的质量或绩效将进一步恶化或衰减,然而不论退出与否行为体都仍需关注体系绩效的恶化态势。<sup>[29]</sup>以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为例,一国出于对国际体系的不满或别的原因而决定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但事实上这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任何一国都置身于国际体系之中,其发展与国际体系息息相关,它必须时刻关注国际体系的变革与稳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孤立主义。<sup>[30]</sup>

赫希曼认为,在绩效衰减发生后,体系行为体可能会选择两条途径表达其不满。一是某些行为体决定退出体系,不再购买体系的产品。二是某些行为体决定继续留在体系中,但却会径直向体系的管理者,管理者的上级,或以一般抗议的形式向任何关注他们的别的行为体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sup>[31]</sup>当然,还有的行为体可能选择默默忍受,期待体系自动改善,这是种忠诚行为。

在国际体系变革发生、或国际体系的(相对)绩效衰减发生后,单元层次的行为体也可有上述选择,但由于相对绩效衰减与公用(害)物品的存在而有较大的区别。在国际体系中,退出选择往往比较困难、因而也极为稀少;即便可能,其代价也必定相当高昂,这代价小到从此不得再次加入,大到被体系消灭,中等程度的代

价可能包括遭驱逐、遭孤立、遭围攻等,而且大都会背上“叛徒”的不良名声。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可说是退出国际体系的典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围攻等等“惩罚”使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未能获得一个正常的发展环境,更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被灭亡的代价。<sup>[32]</sup>

“当退出机制可望而不可及时,呼吁便成为消费者或会员宣泄情绪的唯一选择。”<sup>[33]</sup>呼吁的运用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随处可见。同样,由于相对绩效衰减与公用(害)物品的存在使忠诚度上升、退出困难,增加了呼吁机制的另两个选择,那就是以退出作为威胁的呼吁和以抵制为手段的呼吁。以退出作为威胁的呼吁给予体系这样的信息,即如果体系的相对绩效衰减得不到改善的话,行为体将会退出体系。二战前希特勒对此运用尤为精纯,无论是在逐步实现军备目标、还是在逐步扩大领土面积方面,希特勒都使当时以英法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信,如果德国认为太不公平的现象得不到缓解,德国政府与人民的行为将是难以预期的。<sup>[34]</sup>抵制则发出与退出威胁相反的信息,它承诺如果绩效衰减状况得到改善的话,行为体将不再抵制、重新回到体系中来。当前的朝鲜核危机实际就是一个显例,由于美国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国家”名单,朝鲜安全环境大大恶化,因而朝鲜以开发核武器作为抵制手段,呼吁美国给予安全保障,如果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朝鲜将不再抵制、不再开发核武器。<sup>[35]</sup>以退出作为威胁的呼吁和以抵制作手段的呼吁,为体系的变革带来的影响远比正常呼吁的影响为大。

#### 宽容与不容异己

国际关系体系与经济体系相比的特殊性,使得退出选择难以实现,呼吁也就成了最为主要的手段,从而导致体系必须对行为体的回应再作出回应,这就涉及到国际关系变革的第三个方面,即体系对行为体反应的宽容与不容异己。

宽容,就人类而言,是一种对待别的个体或群体的根本政治态度;更确切些,它是有关不同历史、文化和认同的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sup>[36]</sup>宽容的意愿来自于一种信念:对别人的宽容反过来能得到别人的宽容。<sup>[37]</sup>也就是说,宽容基于确保有关自身独立、自由的一切都不受干扰。相互宽容与其说是取决于对双方善意的依赖,还不如说是对那些防止不良效果的体制的依赖。<sup>[38]</sup>而不容异己则更经常地是因为缺乏相互确保和平期望的体制。这样,宽容表现的是一种对差异性的

主动或被动的接受。<sup>[39]</sup>

宽容与不容异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表现甚于任何国内体制。国际关系理性主义思想传统认为国际社会的和谐性本质使它成为一种宽容的体制:只要行为体能够获得国家地位,就能由此得到宽容。因而,宽容是主权可取性的一个重要原因。<sup>[40]</sup>随主权原则而来,国际社会宽容包括主权国家平等、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且互不干涉内政。这宽容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而更加接近绝对。而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则更为关注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国际不容异己。由于生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每个国家都不敢确信能依靠别国的善意和自我约束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财富和权势,这势必导致国际不容异己。这种相互的不容异己的作用与反作用循环往复,构成了国际政治中冲突与危机的一大成因——安全两难。<sup>[41]</sup>

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看到国际体系必然会对因体系变革压力而来的行为体的回应作出再回应。行为体的回应中,有的确实是针对国际体系变革中可能产生的副效应、即绝对的绩效衰减的回应;而有的则是对可能促进体系演进的积极因素的抵抗、即相对的绩效衰减的回应。不管何种回应,体系所作出的再回应都既可能是宽容的,也可能是不容异己的。如果这些绝对绩效衰减的确威胁到了国际体系的生存,体系将不得不对这些呼吁予以正面的回应,宽容之,并允许这些呼吁行为体的成长。然而,这些对绝对绩效衰减的呼吁往往代表了体系前进的方向,换句话说,就是代表了新的体系因素;现有体系对新体系因素的宽容从长远看可能导致其自身的最终被消灭。因此,当这些新的力量发展壮大到对现有国际体系可能产生威胁的时候,现有国际体系就可能不再对其予以宽容,而采取不容异己的手段。但此时新体系因素可能已经足够强大、已能抵抗来自现有体系的不容异己,并很可能进行反攻,现有国际体系则又很可能反过来采取被迫的宽容态度。与此相类似地,对相对绩效衰减呼吁的回应可能一开始是宽容的,因为对相对绩效衰减进行呼吁的行为体往往是体系中的最为主要的、得益最多的行为体,它们在体系建立之初是体系的支撑力量,因而也是代表现有体系的力量。为了维持体系的稳定、至少是保证体系的主要行为体的主要利益不致受到太大的损害从而导致体系的不稳,现有国际体系会对相对绩效衰减的呼吁予以宽容,并可能允许这些主要行为体对另一些代表新的体系因素的行为体采取不容异己的手段。但随着体系的变革使体系日渐

远离最初建立时的模式、新的体系因素日渐成长并在现有体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国际体系出于自身生存——哪怕是经过某种变革后的生存——的目的也将会对体系中的保守势力取不容异己的态度,这是种被迫的不容异己。

体系对行为体呼吁的宽容与不容异己过程实质上是新旧体系间的宽容与不容异己。旧体系的组成部分中有些坚决抵制甚至欲摧毁新体系因素,而有些则比较支持新生体系因素的成长;新体系也不断进行斗争,在其冲击下旧体系因素有些逐渐消失,也有些作为新体系的组成因素留存下来。如此循环往复,国际关系传统或者得以深化、或者受到挑战,国际关系体系也逐渐由量变走向质变,由旧体系走向新体系,使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发展得以实现。

#### [注释]

- [1] Vincent Ferraro, "The Challenge of Tradition," A Talk to the Mount Holyoke College European Alumnae Council, Amsterdam, 22 March 1997,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amster.htm>. 霍布斯鲍姆在其《革命的年代》一书中也对这三大传统作了论述,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章。
- [2] John P. McKay et al., *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9), pp. 558-569.
- [3] Walter C. Opello, Jr. and Stephen J. Rosow,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 87.
- [4]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chaps. 2-5.
- [5] 时殷弘:《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兼论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预》[J],《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 [6] Lynn H. Miller, *Global Order: 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0), chap. 2.
- [7] Micheal Akehrust,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ition (London: Unwin Hyman, 1987), pp. 12-13.
- [8] Stanley Hoffmann, "Hedley Bull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6, p. 187.
- [9]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3页。
- [10] Micheal Howard, "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Howard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Essays*

- Presented to Captain B. H. Liddell Hart (London: Cassell, 1965), pp. 5-6.
- [11] George F. Kennan, "Foreign Policy and Christian Conscienc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03, No. 5 (May 1959), p. 44.
- [12] Ferraro, "The Challenge of Tradition".
- [13] Hedley Bull, "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40-45.
- [14] "爱国主义将个人的无私转化成民族的利己主义。"尼布尔精确而简练地概括了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两大传统间的矛盾的统一。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第73页。
- [15] 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页。
- [16] K. J. Holsti,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pp. 7-9.
- [17]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引语见"引言", 第3页。
- [18] [19]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 第20页, 第21页。
- [20]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参见 Susan Olzak,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该书以生态竞争理论和尼采的强权理论为出发点, 对人口增长对于移民、种族集体行动以及社会冲突等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 [21] Daniel Little, "Explaining Large-Scale Historical Change," (2000), see <http://www-personal.umd.umich.edu/~delittle>.
- [22] 关于"脱域机制"内涵的论说,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 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8-26页。
- [23]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52页。
- [24] Cary Coglianese, "Trans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From Nation State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Fourth Annual Vision of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Conference (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 1999), pp. 1-2.
- [25] 弗里曼·戴森:《想象中的世界》[M],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9, 40页;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M], 第376页。
- [26]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 第23, 1页。
- [27] 阿尔伯特·O·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28]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39—146页。
- [29]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 第104—111页。
- [30] 关于孤立主义并不孤立、或者说无法真正孤立的论说, 可参见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7), chaps. 6, 7.
- [31]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 第4—5页。
- [32] 应该承认, 这里暗含一个假设, 即这期间的国际体系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太错, 而社会主义的革命性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西方所共同承认的。另外关于社会主义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环境的不正常, 仅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的国际政治斗争便可得出这一结论。这一局面并未因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改善多少, 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或许可部分说明这一点。
- [33]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 第36页。
- [34] 关于德国对威胁退出的运用的阐释, 参见 Craig 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p. 84.
- [35] 时殷弘:《论如何认识和对待朝鲜核危机》, 土柏咨询网, 2003年5月3日, <http://www.pen123.net.cn>.
- [36] [40] 迈克尔·沃尔泽:《论宽容》[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页, 第19页。
- [37] David Fagelson, "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From Westphalia to The Law of Peoples?"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200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0), p. 14.
- [38] 沃尔泽:《论宽容》, 第23页; 关于国际体制塑造和巩固国家间和平期望的论述, 可参见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9-64.
- [39] 这里的论述主要依据沃尔泽:《论宽容》, 第10页; 及 Fagelson, "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pp. 10-11.
- [41]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 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第十三章;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dem,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1976).

作者简介: 潘亚玲、张春,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科社教研室讲师。(上海, 200433)

收稿日期: 2003-09-01

修改日期: 2003-11-11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Soft Powe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Security Strategy** *by Zhao Ga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merica makes all efforts to promote its soft power strategy, in the hope of assimilating other cultures by means of “attraction” and “persuasion”. To safeguard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trend of the global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proper countermeasures are to use Marxist dialectic analytical method and to approach from the heigh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screen domestic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in order to establish effective preventive warn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 the advanced national cultur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5 **The Principle of Global Governance: Democratic Governance** *by Lin Qiping*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occur in many field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 we are facing many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global crisis and to coordinate effectively the interests and 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tors, we should set up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based on democracy for global governance.

- 9 **Japanese ODA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 and Comments on Japanese ODA Policies towards China**

*by Zhu Yansheng*

The publication of new “ODA outline” indicates the end of Japan’s adjustment of ODA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 After adjustment, the “ODA outline”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the aim of ODA is for Japan’s national interest and takes on greater political color. In a sense, the adjustment of ODA policy implies the adjustment of Japan’s strategy and diplomacy. In the mean time, Japan also adjusted its ODA policy towards China.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5 **The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Pan Yaling & Zhang Chun*

From its very beginning,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followed three traditions: individualism, nation-state, and progressivism or scientism. The three traditions have always been playing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systemic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material and conceptual changes, these traditions are facing challenges from various sides; the “gr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pproaching.

- 21 **A Dilemma: U. S.- Israel Military Aid Relationship and its Future** *by Chu Yongzheng & Zhang Qiman*

The standstill of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nd the growing rampancy of terrorism have put the military ai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n a dilemma. Under this relationship, Israel has a strong sense of insecurity by putting its security in the hands of the U. S., and a sense of restriction in decision-making while the U. S. realizes that the aid has not only strengthened consolidated the toughstand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on Middle East peace but also invited more terrorist attack against the U. S. as a result of increasing animosity of the Muslim world. Nevertheless, this military ai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for some time.